

附錄二

中國的師道

劉真

尊師重道是中國傳統的教育精神。教師之受人尊敬，乃是由於做教師的人，大都有一種崇高的理想與獨特的風格，足以為人效法，為世表率。換言之，做教師的人，必須能善盡其為師之「道」，即所謂「師道」。韓愈說：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」禮記學記篇說：「師嚴然後道尊。」可見尊師即所以重道；如果「師」而無「道」，那就根本喪失了為師的條件而不配受人尊敬了。

教師所負的責任，至為重大；做教師的人，必須具備做教師所應有的充分條件和深厚修養。周禮地官司徒序中，鄭玄註師氏說：「師，教人以道者之稱也。」禮記文王世子篇說：「師也者，教之以事，而喻諸德者也。」學記篇說：「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，又知教之所由廢，然後可以為人師。」「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，然後能博喻，能博喻然後能為師。」「教也者，長善而救其失者也。」又說：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。」孔子說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」荀子說：「四海之內若一家，通達之屬，莫不服從，夫是謂之人師。」韓詩外傳說：「智如泉源，行可以為儀表者，人之師也。」楊雄法言學行篇說：「師者，人之模範也。」韓愈「師說」中說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」由此可見教師不僅要教學生如何治事接物，更要教學生如何立身濟世，必須兼具古人所謂「經師」「人師」的條件，始克善盡教師的職責。一位教師能做到中庸上所說：「君子尊德性而道

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」的境地，才能稱為一位最優良的教師，足見為師之不易。所以孟子說：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。」

中國古來所謂「師道」，就字義而言，可以說就是做教師的道理。朱熹解釋中庸「率性之謂道」的「道」字說：「道，猶路也。」又說：「道者，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。」因此，所謂師道，亦即教師應走的道路，或教師當行的道理。在中國教育史上，大家都承認創立「師道」的，乃是被尊為至聖先師的孔子。孔子以後，能弘揚師道的，自當首推孟子。孔孟以降，至於唐之韓愈，宋之朱熹，明之王陽明等，幾乎每一代大儒，也同時就是一代大師。而歷代大儒在教育方面，所懷抱的理想和樹立的風範，也就形成了中國數千年傳統的師道。

至聖先師孔子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，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典型教師。我們要了解中國傳統的師道，必須先認識中國教育的基本精神，而中國教育的基本精神，自然應以孔子的教育思想學說為中心。

論語一書，據漢書藝文志說：「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，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言也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」所以論語是記載孔子言行最真切的一部書，孔子的教育思想學說，以及他當時教學的精神和風範，都可以從這一部書裏很明白的看出來。而孔子在教育方面所表現的崇高人格與偉大精神，便樹立了幾千年來師道的傳統，成為教師應遵守的典範。為便於研究起見，我願就個人淺見所及，將所謂師道的主要內容，歸納為以下幾點，加

以說明：

一、仁愛為本：論語一書，對於「仁」的討論計有五十八章之多，「仁」字出現凡百有五次，可見孔子及其門弟子對「仁」的重視。綜觀論語中對「仁」的討論，我們可以說「仁」是孔子人生哲學的核心。他認為人生的究竟在於求「仁」，以「仁」為人格的最高表現，而「仁」之具體實踐即教育之最後目的。所以他說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（述而）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（衛靈公）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（里仁）並勉勵他的學生要「當仁，不讓於師。」（衛靈公）所謂「仁」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人的本性，也就是愛人之心，為人心所固有、所同有。孔子說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（中庸）孟子說：「仁，人心也」（孟子告子篇）又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（孟子公孫丑篇）論語上說：『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愛人」。』（顏淵）孟子亦云：「仁者愛人。」（孟子離婁篇）韓愈更明白地說：「博愛之謂仁」。（原道）可見「仁」就是人人所固有和所同有的一顆「愛人之心」。所以「仁愛」兩字，經常是被連用在一起的。一個有仁心的人，其表現於社會方面者必為博愛，而以服務社會、造福人群為人生的目的。孔子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的宏願，就是一種最好的憧憬；其表現於個人方面者必為樂觀奮鬥的精神，孔子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的生活態度，就是這種精神的最好寫照。我們如何才能使日常行事合乎「仁」呢？孔子認為要分兩方面去做：消極方面，要做到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」也就是大學上所說的「絜矩之道」；積極方面，要做到「己立立人，己達

達人。」所以當仲弓問仁時，他說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（顏淵）當子貢問仁時，他說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（雍也）可見一個人的行事，倘能處處從推己及人著想，便自然可以做到合乎「仁」了。孔子所說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就是孔子「一以貫之」的忠恕之道，也就是仁道。論語說：「子曰：『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』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（里仁）又「子貢問曰：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』子曰：『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」（衛靈公）所謂忠恕，據朱熹說：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及人之謂恕。」「己立己達」是忠，「立人達人」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是恕，合而言之為「仁」，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孔子之道是以「仁」一以貫之的。（因「仁」為眾德的總稱，兼具眾德的內容，故可稱孔子之道是以「仁」一以貫之的。）由此可見孔子的一切思想學說都是以仁愛為本。大學所說的「明明德」和「新民」，中庸所說的「成己」「成物」，以及孟子所說的「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」，和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；都是由「盡己」而「推己及人」，無不以仁愛為出發點。孔子為集我國古代文化學術之大成者，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學術思想，可以說都是以孔子的思想學說為範疇，因此有人認為中國以往數千年的文化學術，可統名之為「仁學」。至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，他自己曾明白地說是以仁愛為本的。他曾說：「修道以仁」（中庸哀公問政），中庸說：「修道之謂教」，修道就是教育，「修道以仁」，意即教育以仁愛為本。我們今天努力倡導的所謂「教育的愛」，是和孔子以

仁愛為本的教育精神完全符合的。

二、有教無類：在孔子以前，我國古代的社會，政教合一，以吏為師。當時書冊均藏於官府，教育權操之王宮，只有一部份貴族子弟，才有機會至官府研究高深的學術。到孔子時代，由於官學逐漸衰廢，民間始有私人講學，孔子便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開私人講學風氣的人。孔子的教育思想以仁愛為本，同時他認為各人天生的氣質原是很接近的；以後由於環境習染的不同遂有智愚善惡的差異。他以為除了絕頂聰明的「上智」和自甘暴棄的「下愚」外，教育對一般人都具有很大的功效。所以他說：「性，相近也；習，相遠也。」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（陽貨）在孔子心目中，天下幾無不可教之人，所以他首先提出「有教無類」的教育主張，打破了古代階級性的貴族教育制度，開我國歷史上平民教育之先聲；這也大大的增加了此後一般平民在教育上政治上的機會（所謂布衣卿相）。因為孔子主張「有教無類」（衛靈公），故謂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（述而）又說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（學而）可見孔子當時設壇授徒，凡自願從其學者，無不欣然接納，來者不拒。據史記孔子世家說：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，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」又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：「孔子曰：「受業身通者，七十七人，皆異能之士也」。」此七十七身通六藝之士，以籍貫論，魯國三十八人，衛國六人，齊國六人，楚國三人，秦國一人，晉國二人，陳國二人，宋國吳國各一人，其餘著籍不可考（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）。是著籍弟子，北及齊國，南及吳國，西北及晉、衛，西南達宋、陳、秦、楚諸國，門徒幾遍全國。孔子當年講學之盛，於此可以想見。孔子所謂

「有教無類」的教育，就是不問來學者身世之貴賤，家境之貧富，天資之智愚，均一律收列門牆，悉心教誨。所以孔子的弟子中，有世卿子弟如孟懿子南宮敬叔，賤人子弟如仲弓，大盜如顏涿聚（見呂氏春秋尊師篇），富裕如子貢，貧窮如顏淵，以及魯如曾參，愚如高柴等。有一次，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之門何其雜也？」子貢曰：「……良醫之門多病人，槩括之側多枉木，是以雜也。」（見荀子法行篇）孔子所收門徒之眾多，及其品類之不齊，就是他實施「有教無類」教育的最好證明。孔子主張的這種有教無類的教育，正是我們今天所要竭力推行的「教育機會平等」的教育。

三、因材施教：孔子認為各人的資質、性情、志趣、和能力等既有不同，故必須按其個性施以不同的教育，所以他特別提出「因材施教」的教學原則。他嘗說：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（智）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（衛靈公）又說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（雍也）這都是說明為甚麼要因材施教的原因。在論語中，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孔子「因材施教」的實例來，而最顯著的一個實例，就是先進篇中所記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與孔子之間的一段問答：「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（子路）也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。」冉有（冉有）也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赤（公西華）也惑，敢問？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此外，在論語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學生所問的雖屬同一問題，但孔子的答語卻並不相同。這都是根據「因材施教」的原則實施教學的。如同問「孝」，

而所答有「無違」、「疾憂」、「敬養」、「色難」等等不同。同是問「仁」，而所答有「愛人」、「克己復禮」、「其言也訥」、「恭寬信敏惠」、「居處恭、執事敬、與人忠」等等不同。同是問政，而所答有「足食、足兵、足信」、「先之、勞之、無倦」、「居之無倦、行之以忠」、「先有司、赦小過、舉賢才」等等不同。同是問君子，而所答有「先行其言、而後從之」、「君子不憂不懼」、「修己以敬」等等不同。同是問士，而所答有「行己有恥」、「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」等等不同。孔子在教學方面，除採取「因材施教」的原則外，並注重應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。他嘗說：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；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（述而）朱熹解釋說：「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意；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啟，謂開其意；發，謂達其辭。」意謂學者對某一問題研究未得之時，教者應趁機善為開導，使能豁然貫通；學者對某一問題，已有所領悟，但不能暢所欲言時，教者應趁機善為提示，使能達其辭。這樣隨機教學，必可使學者對其所研究之問題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獲得徹底的了解。禮記學記篇所說的「進學之道」（「善學者，師逸而功倍，又從而庸之。不善學者，師勤而功半，又從而怨之。善問者，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目。及其久也，相說以解。不善問者反此。此皆進學之道也。」），和孟子所說的「成德達材」的方法（「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達材者，有答問者，有私淑艾者，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」），以及荀子所說的「君子如響（同響）矣」的教學方法（荀子勸學篇：「不問而告謂之傲，問一告二謂之曠。傲，

非也；曠，非也；君子如響（同響）矣。」），可以說都是一種啟發式的教學方法。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嘗說：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」（子罕）可見孔子所採取的「因材施教」的教學原則，和啟發式的教學方法，曾發揮了極大的教學效果。孔子的弟子中，身通六藝者達七十二人之多，我想與他所採用的這種優良的教學原則和方法，是有很大關係的。他所用的這種原則和方法，在二千多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仍然具有很大的價值。

四、以身作則：教育可說是一種「己立立人」「己達達人」的精神事業。必須先求己有所「立」，有所「達」，然後始能「立人」「達人」。大學上嘗說：「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；所藏乎身不怒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所以大學之道，要由「明明德」而「新民」。孔子平日教學最重人格感化，行不言之教，使學者於耳濡目染中，能收潛移默化之功。他嘗說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（子路）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（子路）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（顏淵）又說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（憲問）「君子求諸己。」（衛靈公）「君子不重，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（學而）這些話都是說明「以身作則」在教育上的重要。論語陽貨篇中，有一段記載孔子和子貢的對話，最足以形容孔子以身作則的人格教育。「子曰：『予欲無言。』子貢曰：『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』子曰：『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？』」孔子人格之偉大及其對學生感化之深刻，我們可以從他學生所說的話中看出來。「顏淵喟然嘆曰：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

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；雖欲從之，未由也已！」』（子罕）『宰我曰：「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」』子貢曰：「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」有若曰：「豈惟民哉！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太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，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』（孟子公孫丑）『子貢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！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』（憲問）從顏淵、宰我、子貢和有若幾個人所說的話中，可見孔子在他弟子的心目中，是一位兼具智仁勇三達德、賢於堯舜、自生民以來未曾有過的大聖人。孟子也嘗說：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又說：「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」（孟子公孫丑）足證七十子之服孔子一語，在戰國時代，社會上已頗為流行，孔子人格之偉大與感人之深遠，於此可見一斑。孔子不僅使他的門弟子都心悅誠服，如坐春風之中；連只和他見過一次面談過一次話的人，也無不深受感動，而肅然起敬。論語上記載說，有一次，孔子離開魯國到衛國的儀邑地方，『儀封人請見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』從者見之，出曰：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！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』（八佾）可見閱人甚多的儀封人，一見孔子，即大為仰慕了。這大概便是由於孔子平日實行以身作則的教育，注重個人品德的修養，才能這樣受到當時一般人普遍的崇敬罷。這種「以身作則」的原則，在今日學校教育中，可以说是最應為一般教師所重視的。

五、教學相長：學無止境，不進則退。以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為職志的教師，自須一面從事教學，一面努力進修。所以禮記學記篇說：「學，然後知不足；教，然後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後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後能自強也。故曰教學相長也。」孔子嘗說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」（為政）可見努力進修，吸取新知，為教師應具備的基本條件。孔子一生除年輕時，為了仰事俯養，曾做過委吏（委積倉庫的官吏）、乘由（繁息牛羊的官吏）等小官，及五十多歲時，在魯定公那裏，做過四五年的事以外（定公九年為中都宰，越一年升為司空，後轉為司寇，並攝行相事，十三年去魯適衛），其餘的時間，大都從事教學工作。相傳他二十三歲時，就已在他的故鄉闕里開始授徒。孔子深知「學」的重要和教師責任的重大，故終身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。這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兩句話，實在是「教學相長」四字最好的註釋。孔子對「學」的重視，可以由他對子路說的一段話看出來。「子曰：「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「居，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」（陽貨）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，皆是美德，但徒好之，而不學以明其理，則必各有所蔽，而發生愚、蕩、賊、絞、亂、狂的弊病；「學」的重要，於此可知。孔子嘗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（學而）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（泰伯）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（公冶長）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（述而）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，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（述而）又說：「吾十有五而志

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距。」（為政）他一生好學之篤，與誨人之勤，由此可以想見。更有進者，孔子一生不僅「學而不厭」，且「精於為學」；不僅「誨人不倦」，且「善於誨人」。孔子為學的態度，是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（為政），主張為學先要去掉心理上四種病根，要做到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（子罕）（意是成見，必是武斷，固是偏執，我是私心。）他認為要抱著這種態度和精神治學，才真正能獲得「真知」，做到「智者不惑」。孔子治學的方法，是「學」「思」並重，即「實證」與「思維」並重。他嘗說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；思而不學則殆。」（為政）（王引之經義述聞解釋殆字說：「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，疑而不能定也。」）又說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；不如學也！」（衛靈公）這是說治學的方法，不僅要「學思並重」，並要學先於思。思想不根據有徵驗的事實，則是胡思亂想，徒足擾亂神志。中庸上所說的「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」的為學方法，就是由「學」而「思」而「行」的先後程序。孔子這種「學」「思」並重的治學方法，就是英國哲學家培根所說的「蜜蜂釀蜜」的治學方法，是一種最合乎科學的方法（培根認為做學問的人有三種：第一種人好比「蜘蛛結網」，其材料不是從外面找來的，而是從肚子裏吐出來的；第二種人好比「螞蟻屯糧」，他們只是將外面的東西，一一搬回去儲藏起來，但並不加一番製造消化的工夫；第三種人好比「蜜蜂釀蜜」，他們採擷百花的精華，加上一番釀造的工夫；做成了又香又甜的糖蜜）。孔子的善於誨人，在本文前述「因材施教」和「以身作則」兩段中，已可充分看出，無庸重敘。孔子不但「精於為學」和「善於誨人」，更

善於利用誘人而增進自己的學問。這可從論語上的兩段記載看出來。其一為：「子夏問曰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」。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，商也！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」（八佾）朱熹註：「起，猶發也。起予，猶能起發我之志意。」「所謂起予，則亦相長之義也。」依朱子的註釋，孔子之所以嘉許子夏，一由子夏能聞一知二，一由子夏所提出的問題，足以啟發孔子的志意，使孔子能收教學相長之益。其另一為：孔子批評他最得意的高足顏淵說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」（先進）他的意思是說，顏淵對他所說的話，雖均能默識心通，毫無疑問，心悅誠服，這樣的學生固然很好，但卻不能使教師因學生之質疑問難而收教學相長之益。由此，可見孔子一生，實是無時不學，無處不學，真正做到「學而不厭」了。

六、樂道自得：論語述而篇說：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」孔子所說的這幾句話，不僅充分流露出他樂道自得的神態，也是他一生「學而不厭，誘人不倦」的最好寫照。孔子不但自己樂道自得，並且希望他的門徒們也能臻於樂道自得的境界，故平日多言樂而不云苦。全部論語中，共有四十五個樂字，而未嘗見一苦字，也許就是這種原因。孔子樂道自得的精神（亦即今日所提倡的專業樂業精神），可以從很多地方看出來，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，便是孔子講為學的樂趣。他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又嘗說：「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。」（雍也）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述而）「賢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

堪其憂，回也，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。」（雍也）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；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（述而）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；知我者，其天乎？」（憲問）這些話，都可顯示出孔子樂道自得的精神。論語上還有兩段記載，也可看出孔子這種樂道自得的精神，其一為：「子在齊，聞韶，三月，不知肉味。曰：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！』」（述而）其樂道有如此者。其另一為：有一次，子路、曾晳（曾子父，名點），冉有、公西華等四個學生侍坐，孔子令各言其志，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三人，均言願從事一國之政治，最後輪到曾晳，時方鼓瑟，乃作而言曰：「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孔子喟然嘆曰：「吾與點也。」（先進）孔子獨讚美曾晳，是因為曾晳的治學精神，是藏焉息焉，修焉游焉，已臻於以學為樂的境界。再孔子嘗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（述而）朱熹註：「游者，玩物適情之謂，藝，則禮樂之文，射御書數之法。」「游於藝」，意即以娛樂的心情，去學習禮樂之文與射御書數之法。這真是孔子樂道自得的最好例證。又論語載：「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」（述而）朱熹註：「申申，其容舒也，夭夭，其色愉也。」意即孔子平日閑居之時，總是和顏悅色，怡然自得。孔子嘗說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（子罕）又說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常戚戚。」（述而）人生的最高境界，是不惑、不憂、不懼；坦蕩蕩，樂道自得。綜觀孔子的一生，可算是真正達到這種人生的最高境界了。

以上六點，我認為是孔子最主要的教育精神和施教原則，也可以說便是中國傳統的師道。我們今

天每一個做教師的人，在紀念孔子誕辰和教師節的時候，都應該體認這種傳統的師道，效法孔子偉大的教育精神和崇高的教育風範，不厭不倦，立己立人，切實負起「良師興國」的神聖責任。

（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誕辰紀念及教師節作）